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12）

下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世界五千年

印度的独立

大多数人都相信印度在独立的进程中走过的是一条非暴力的道路。

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道路，只有前进。尽管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条充满着斑斑血迹的曲折小路，然而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他们高举着非暴力大旗，最终使印度走向了独立。

印度，这个素来以“遍地是黄金和香料”而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天堂”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到 16 世纪末的时候，仍然没有失去它在西方人眼中的魅力。

从中世纪宗教的压抑下刚走出不久的欧洲人，似乎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富于欲望和野心，他们在先进文明的支持下，轻轻敲响了印度这扇东方大门。

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莫卧尔封建王朝，开始并没有把这些前来同自己进行贸易的外国人放在眼里。但他们拥有这样的心情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在短短的百余年后，他们便深深认识到，这些外国人，已经成为他们最大的敌人。一直呆在印度海岸的等待时间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的英国人欣喜地发现，莫卧尔帝国在风起云涌的起义中摇摇欲坠。同时，各地总督割据、民族冲突和宗教

冲突也交织在一起。阿富汗人也趁火打劫。强极一时的莫卧尔帝国陷入了一片混乱。

不列颠人抓住时机地实现着自己的野心。此时的东印度公司已成为一个集政治和商贸于一身的英国代言人。他们在印度的土地上甚至有上万士兵的军队。公元 1757 年，英国人在印度内奸的配合下以 3000 士兵战胜了 7 万印度人，孟加拉沦为英属殖民地。在这以后长达 92 年的时间里，英国人一步步将这个人口达 1 亿多的东方大国沦为了自己的殖民地。公元 1849 年，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英国人战胜锡克人，兼并了旁遮普，整个印度完全沦为殖民地。在印度沦陷的长达 92 年的战争中，在更多的时候，是印度士兵的枪口在英国军官的指令声中瞄准了另一个印度士兵的胸膛。古老的帝国蒙上了许许多多的血迹斑斑。

英国人在把印度沦为殖民地后，继续推进他们扩张计划，忍无可忍的印度人也拿起武器积极反抗英国。最先起来战斗的是少数的封建主和印度下层人民，但是这种斗争由于其狭隘的目的而被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并没有能够团结起更大规模的斗争。起义很快就被英国殖民者镇压下去。

印度是一个处处渗透着宗教思想的国度，宗教具有巨大的力量。但是当这个东西一旦同反英的目标结合起来，反对殖民者的斗争就立刻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831 年，加尔各答附近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起义便是号召进行圣战以赶走英国征服者，但在英国人的大量军队包围中，起义仍然走向了失败。目标直指英国侵略者的提法无疑使独立斗争前进了一大步。

终于在 1857 年 5 月 10 日，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从米鲁特开始发生了。这场地区占全印度的六分之一、人口占十分之一、持续二年多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各个阶层、各个宗教派系的人放弃前嫌共同站在了民族主义的大营中。但是，这场主要由封建主领导的起义最大的目的便是恢复以前的统治秩序。这使得起义虽然有积极的组织和响亮的口号，仍然最终走向了失败。无数鲜血的流淌不能不促使印度人思考更加合理的斗争方

式。

印度民族主义的先驱是兰姆·莫罕·罗易，他被称为印度民族主义之父。他反对中世纪的印度教思想体系，形成了一元化的宗教哲学，建立梵（即神）无往不在的梵教派。1828 年，他在加尔各答创立梵教会，提出一些改革要求，如对欧洲人实行同样的裁判权，建立陪审制度等。罗易逝世后，梵教派逐渐抛弃了宗教形式。梵教派领导人凯舍夫在 1870 年创立印度改革协会。1875 年，苏伦德拉·纳特·巴纳吉创立印度协会，这是第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组织，到 1878 年，全国已有 124 个分支，几乎遍及印度各地。

1883 年，加尔各答印度协会召开第一次全印度代表大会，出席者有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和联合省的代表。这些都表明：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正在孕育诞生。

1885 年 12 月 28 日，在孟买召开了全印国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大会党。国大党代表地主、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没有提出民族独立的主张，只要求通过和平和合法方法，争取民族平等，实现自治和发展社会经济。

1885 年 12 月 28 日，印度国大党在孟买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从此，印度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开始走上争取印度独立斗争的政治舞台。

但国大党一开始并未走上激烈的反英道路，他们不支持反英起义，而希望通过改良来达到目的。他们相信英国人有公平、正义的本能，能够最终醒悟到责任而还给他们自由的国家。但他们不断在流血的事实面前碰钉子。英国人变本加厉地榨取印度的资财，毫不手软地扼杀稍稍对他们的统治表示怀疑或反抗的人。印度高筑的债台，无数人死于饥荒的事实，使他们开始摒弃原来的主张，而把争取独立的主动权留给了自己。但在通过什么方式达到成功的问题上，国大党曾一度在非暴力和武装起义之间徘徊。但他们知道，不管是非暴力还是武装起义，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具备一个基础——充分发动群众。这在他们后来的斗争中都明显地展现出来。

暴力斗争仍在印度的国土中不断出现。1905 年到 1908 年，是印度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高潮时期。以孟加拉的反分割斗争开始，很快发展成为全印运动。无数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走上了战场。这是一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地主参加的国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斗争一开始就提出自治的口号，特别是以提拉克为首的左翼曾提出完全独立和建立联邦共和国的要求。这次起义是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印度国大党一开始便对英国的统治持温和的态度。他们甚至一度为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歌功颂德，认为英国人在促进印度文明方面立下的功劳大大高于他们给印度人民带来的灾难。然而血的现实给了他们教训，他们不久就收起了这种想法。

1916 年，提拉克成为国大党的领导人，他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温和派的观点，提出了司瓦拉吉政治纲领。司瓦拉吉来源于吠陀经典，意为自主。他说：“只有一种药能治印度人民的病，这个药就是政权。它应当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国大党终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把独立后的印度变成“联邦共和国”的要求也写进了斗争目标。同时，国大党还充分注意到了发动群众后所构成的巨大力量，并从各个方面着手，把不同阶层的人都争取到自己扛起的旗帜下来。对于斗争方式，提拉克便排除了武装斗争的可能，而提倡非暴力。他说：“只要印度人不替他们打仗、征税、维持治安，他们

的统治机器便会瘫痪。”他要人们准备进监狱，准备吃苦。他积极倡导发起了抵制英货的斗争，也就是著名的司瓦德西（自产）运动，让印度人用自己做的东西，不买英国人的货物。这次斗争的效果更使这种非暴力方式深入人心。

宗教与争取独立斗争的结合进一步增强了非暴力方式的生命力。当提拉克感到恢复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于斗争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时，他想找到一个强大的精神武器来恢复这种感觉。提拉克把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印度教。这个与宗教有着悠久的渊源的国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又想到了这个武器。这使得人们虽能在这个飘摇的大旗下聚到一起，但他们准备采用的方式却是一种与他们实际具有的力量极不相称的方式。他们坚信，他们的虔诚将感动万能的神，从而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自从 1905 年到 1908 年蓬勃的运动失败以后，印度便陷入了有史以来的低潮期。国大党内部的矛盾也明显暴露出来。由于提拉克的被捕入狱，极端派濒于瓦解。温和派乘机在国大党内掌握了权力。他们通过了只有“通过宪政手段，通过逐步改革现行统治”实现自治的新道路。这样，群众运动、抵制更不用说合作的消极抵抗，都在他们的排斥之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16 年。这一年，迫于内外形势的压迫，极端派和温和派携起了手。提拉克再次挑起了主席的重担。但是他害怕这个印度最有力量的领导集团再一次陷入分裂，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尽量不作使两方争吵不休的决定。他可以提出自治的目的，但再也不敢轻易提不合作或消极抵抗了。

但更加严峻的形势使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希望摆脱英国人的印度以此为条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这场战争中付出高昂代价的印度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之中。英国从印度征调了 150 多万士兵和价值 2 亿多英镑的粮食和物质，加重了印度人民的负担。殖民当局还对农产品强制征购，导致大量农户破产，农业衰退。1918 年至 1919 年印度发生了大饥荒和流行性感冒，夺去了 1200 多万人的生命，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激化，反英斗争空前高涨。1918 年，罢工浪潮席卷全国。一些重要城市出现了工会，旁遮普等地发生了农民运动，大规模地反英高潮到来了。

当时，英国殖民者采取了怀柔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1918 年 7 月，英国抛出了一个由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英国驻印总督柴姆斯福联合签署的“孟太古- 柴姆斯福改革方案”。其中主要内容有：第一，在总督之下设立两院制立法机构，其成员一部分由选举产生，另一部分则由指派产生。由于总督有权否决它的任何决议，立法机构形同虚设。第二，各省政府里的一些次要部门可由英国省督（省长）任命的印度厅长去管理，而警察、财政等重要部门及中央政府的各部门仍留在英国人手中。“孟太古- 柴姆斯福法案”虽然得到了一少部分上层人士的支持，但平息不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

就在这样紧要的关头，国大党却表现得相当的软弱无力。无奈的提拉克在提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响应性合作策略后，再也没法前进一步。印度，到了一个需要强硬的领袖时代。

就在这时，圣雄甘地扬起了一面大旗，他使得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像大火一样燃遍了印度。

甘地于 1869 年出生在古吉拉特的一个土邦的中层家庭中。他的家族是一个恪守教规的虔诚家族，反对暴力运动，禁止杀生，这对甘地的成长有着巨

大的影响。幼年的甘地便信奉印度神话中的两位圣哲，一位代表诚信，一位象征牺牲，这种信奉一直到他死去都没有改变。

1892 年，甘地结束了在伦敦三年的法律学习，返回了印度。不久有公司请他到南非去办一件诉讼案，然而在南非所见的一切和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件令他极其屈辱的事，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

他踏上了去南非首府的头等火车厢。在火车抵达第一站彼得玛利兹堡时，一个欧洲白人走了进来，他看见甘地这个有色人种居然同高贵的他们同居一室，尽管甘地穿着英式衣服，他仍然怒气冲冲地向车长提出把这个“臭苦力”赶到行李车厢。当甘地据理力争时，竟被驱逐下车。甘地说，这是“我生平从未受到过的侮辱。我的积极非暴力行动就从这天开始。”不久他便四处阐释他的非暴力主义思想。同时谴责南非政府的种种歧视法规，如限制印度人旅行，禁止罢工，只承认基督教式的婚姻为合法婚姻等。他的行动和主张得到了南非印度人的强烈响应。直到南非政府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压力下颁布一项历史性的革新法案为止。甘地和他的非暴力思想，不仅在南非，而且在印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5 年，甘地回到了多事之秋的印度。

但他从积极非暴力走向非暴力不合作思想这一转变，是在他更清楚地认识英国人之后。刚回到印度的他尽管目睹了王公贵族的糜烂奢侈和穷苦人的疾病、饥饿、死亡，但他并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他认为，英国人本质是热爱正义的，英国人在印度犯下的错误是他们偶尔背离其本质的行为，是能够在完善自身的前提下促使英国人改善的，而且可通过与英国人的密切合作去实现的。他的司瓦拉吉观也建立在与英国人合作的基础之上，认为通过英国人的帮助和引导，可以缩短达到目的期限。因此，他仍然广泛倡导他在南非取得胜利的斗争方法——积极的非暴力。他认为，要进行坚持真理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原则就是：坚持真理和非暴力。他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武装起义，认为那是扩散仇恨，与爱的原则背道而驰。并说靠武装斗争并不能使人的精神完善，而是趋向堕落，不是争取司瓦拉吉，而是离它越来越远。他明确宣称，要用自己的牺牲去感化别人，要爱一切人，包括英国人。

1919 年 3 月，英殖民当局又颁布了《罗拉特法》（因法官罗拉特提出此法案而得名），规定英国殖民当局有权逮捕任何一个有反英活动嫌疑的人，不经审讯就可以判处监禁和服苦役。《罗拉特法》引起了印度广大人民的愤怒，全国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印度工人阶级队伍缺乏必要的团结和统一，因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就落到了以甘地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手中。

1919 年 4 月，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甘地及其领导的国大党决定成立“萨蒂亚格拉哈同盟”，号召印度人民举行总罢工和绝食，对《罗拉特法》实行非暴力抵制。在许多城市发生了罢工、罢课，甚至武装冲突。特别是旁遮普省的反英运动尤为激烈、广泛。英国殖民当局在该省的工业中心阿姆利则逮捕了两位民族运动活动家克其鲁和萨提亚帕尔，引起了群众更强烈的抗议。火车站、电话局被占领了，该市和其它地区的一切联系被切断了。4 月 13 日数千名群众在阿姆利则的一个广场上集会，英军堵住广场出口，未作任何警告就用机枪向赤手空拳的群众扫射达 10 分钟之久，打死 400 多人，打伤 1200 人，造成了有名的“阿姆利则惨案”。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印度人民更大的愤怒，全省有 50 个城镇和地区爆发了反英运动和起义，如孟买、阿麦达巴德、

加尔各答等地爆发了罢工和暴动。

在反帝斗争高涨的形势下，国大党提出了领导这场斗争的主张，极力把斗争控制在非暴力的范围之内。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在第一次全印基拉法大会上得到了接受，这个穆斯林组织决定从 1920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不合作运动。内容包括放弃荣誉称号、抵制立法会议、抵制法庭和官办学校等。甘地的不合作主张既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拥护，也得到了上层知识分子和激进政治家的支持。但甘地对自己能否获得国大党的支持却不敢轻下结论，而这对于他的主张的实施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自己也清楚：“ 极端派不同意我的观点，……温和派也不会走得像我这样远 ”。他的不合作主张一提出来，党内的反对势力便攻击这一观点并骂他是狂人。在 1920 年 9 月举行的国大党特别会议上，5800 多名代表济济一堂，探讨甘地的主张，实际上，这个给非暴力赋与了新的含义的运动既包含了极端派与温和派的观点，又将两者的观点都拒之门外。但这个更接近实际斗争意义的观点最终获得了胜利，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在印度领土上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这对于长期陷入盲且状态的独立斗争来说，实在是一剂强心针。1920 年 12 月，国大党在那格浦尔年会上，甘地的纲领没经过太艰巨的斗争便获得了胜利，年会还通过了甘地主持起草的国大党新党章。在这次被称为“ 甘地的大会 ”上，非暴力不合作作为一条不可置疑的原则，被牢固地确立下来。

1921 年，工人罢工增加到 396 次，殖民政府中的印度职员抛弃工作，大学生纷纷加入国民义勇团，全国掀起了手摇纺织运动的高潮，以抵制英货。广大农村也出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怒潮。1922 年 2 月，联合省的曹里曹拉村农民举行游行，遭到警察射击，愤怒的群众袭击警察所，烧死了 22 名警察，殖民当局采取了报复措施，杀害了 44 名农民，流放了几百人。甘地没有谴责殖民者的暴行，却声称这是自己“ 最惨痛的耻辱 ”。曹里曹拉事件成了甘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借口。1922 年 2 月 12 日，国大党通过了决议，对曹里曹拉群众“ 惨无人道 ”的行为表示遗憾，并说“ 农民拒绝向地主缴租是违反国大党的决议和损害国家的最高利益 ”，宣布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自己也被关进了监狱。

1924 年从监狱出来后，甘地把运动主要放到了抵制英货、推行自产上。同卢梭一样，甘地也认为现代的文明是罪恶，它使人在残酷的竞争和损人利己的疯狂行为中堕落。印度不是被刀剑统治，而是“ 压抑在现代文明之下 ”。更主要的是，他看到抵制英货给英国人带来的直接而巨大的打击。于是，他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了规模空前的自纺运动。他自己也在家里竖起了一个自纺棉纱的手摇纺织机，还组织一次大会把英国布匹和用英国布匹做的制服烧得干干净净，无数的人响应他的号召，整个印度用纺车浑浊的吱嘎声传递着他们的不满与信心。

甘地不仅自己不怕坐牢，他也号召人民不要怕坐牢。执行非暴力策略，坐牢本身就是一个最坚强有力的部分，这一认识使监狱不但失去了其望而生畏的震慑力，反而使人们觉得坐牢是一种光荣。甘地自己在被监禁一次后，于 1932 年又一次被投入监狱。他在印度的监狱中度过了 2100 天。但他仍然无所畏惧。说：“ 对我来说，监狱是圣堂 ”。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从 1930 年 3 月 12 日甘地发动的‘ 食盐进军 ”开始的，这一天甘地率领 78 名门徒从阿麦达巴德出发，走了 3 周多，于 4

月 5 日到达丹地海滨。他们在海滨自制食盐，号召人民反对“ 食盐专卖法 ”。甘地的“ 食盐进军 ”点燃了全印度抗英斗争的烈火。但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很快又发展为暴力斗争，在吉大港、白沙瓦、绍拉普尔和加尔各答等地都爆发了武装起义。

受到强烈震憾的英国人调集大批军队进行镇压。但在警察狂飞乱舞的大棒面前谁也没有反抗，面对横飞的子弹他们也照样挺起胸膛。这招失败后，当局只得采取妥协办法，于 1931 年 3 月 5 日签订了有名的《甘地—欧文协定》。但这个协定只是使不合作运动得到了短暂的平静。当英国人照旧大肆镇压人民的事实发生后，1932 年 1 月 1 日和平抵抗运动再次爆发。无可奈何的当局于 4 日逮捕了甘地，并用更严厉的手段镇压抵抗运动。直到 1934 年 5 月，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才作为一个阶段停止下来。

这次卓有成效的运动极大地唤醒了印度人民的独立意识，也使得印度独立在英国人心目中被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动广泛的群众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使国大党穆斯林组织和英国人都相信，印度独立已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印度内部复杂的矛盾此时已愈加明显。在甘地被捕后留下的政治空间中，国大党与穆斯林组织相互攻击，互不妥协，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流血冲突不断发生。整个印度又陷入到宗派纷争之中。英国人逐渐对印度国内纷繁的局势丧失了信心，不准备在这儿长期染指了。1940 年 10 月，甘地再次发起不合作运动抵制英国在二战中让印度参战、却又对印度的要求毫无诚意的做法。但随着局势日渐吃紧，英国人终于迫于战事的压力而妥协。1946 年 2 月 18 日，皇家印度海军新兵又因英国人的某一阴谋败露而发生哗变。英国人对于印度国内的统治已实在无力支撑下去了。

终于在 1946 年 2 月 19 日，英国首相宣称将“ 与印度公认的领袖们协力，以促成印度完全自治的早日实现 ”。在印度国内日趋尖锐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的对立中，英国政府于 1947 年 2 月 20 日作了一个重要的声明，宣布最迟在 1948 年 6 月退出印度，并在蒙巴顿勋爵的安排下完成政权移交。

1947 年 6 月 3 日，蒙巴顿在广播中发布了印度人民为之奋斗了两个世纪的历史性公告，这便是“ 政权移交办法 ”。在印度人欢呼独立的同时，他们无比悲痛地看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余下部分，已被活生生分成两个国家。

1947 年 8 月 15 日，政权正式移交，它庄严宣告了印度的独立。印度人民终于以具大的牺牲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赢得了自由。

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

1770 年 12 月 16 日，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恩的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父亲是个不走运的男高音歌手，自负而无聪明可言，且酗酒成性。女仆出身的母亲是他全部爱的源泉。这样的家庭实在无法给予贝多芬温情。一开始，人生对他来说就是悲惨和残酷的。他的父亲想开拓儿子的音乐天分。贝多芬 4 岁时就被关在家里，陪伴他的是羽管键琴或一把提琴。少年时代的贝多芬不得不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钱买面包，这个遭遇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音乐家，直到他进入天堂。11 岁时他加入戏院乐队，13 岁他当了大风琴手。1787 年贝多芬的母亲去世，贝多芬痛苦万分，“ 她对人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 ”17 岁的贝多芬就靠技艺养家糊口了。看来贝多芬的那个男高音父亲并非鼠目寸光，相反，他具有“ 远见卓识 ”。儿子稚嫩的肩膀托起了生活的重担，虽苦苦支撑，毕竟尚能过活。

悲惨的童年并没有使他憎恨生他养他的故乡，他一直对波恩和莱茵河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从没有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和爱抚；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处，蓝色的山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弃的古堡……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终了，但这种思念却也是凄凉的，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但直到升到天国也未能如愿。

母亲去世后，贝多芬进入了波恩大学，不久，又离开故乡，住到音乐之都——维也纳。这个美丽的城市给了他一生的酸甜苦辣。他从此就住在维也纳，直到撒手人寰。赞美和嘲弄、鲜花和唾沫都是贝多芬从这里得到的“ 奖品 ”。

贝多芬一生总是伴随着悲苦。他刚刚在维也纳站稳脚跟后，厄运就光顾这个“ 熟人 ”了。1796 年，他的耳朵聋了。耳朵日夜作响，内脏也受到剧烈痛楚的折磨。好强的贝多芬开始守口如瓶，他避免见人，以使他的残废不致被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痛苦！但到了 1801 年，他再也不能缄默了。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芒达……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极了。得知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衰退了。……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之所，固然我曾发誓要超临祸害……　　 ”这是多么伤心欲绝的内心吐露！贝多芬此时也被这深深的痛苦折磨得几乎绝望了。对贝多芬来说，命运太不公平了。

然而，贝多芬没有向命运屈服，当他的爱人弃他而去后，他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甚至他还给兄弟写了遗嘱，注明“ 等我死后开拆 ”。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但是，他的坚毅的天性使他不能在遇到磨难时就屈服，“ 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 ”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的都城里是不得人心的。他抓住可以离开它的机会。1808 年，他很想到威斯特伐利亚王奚洛姆 · 波拿巴的宫廷里去。但维也纳的音乐源泉是丰富的，

我们也不该抹煞那里常有一些高贵的鉴赏家，他们感到贝多芬的伟大而不肯使国家蒙受丧失这等天才的羞耻。维也纳的几个贵族答应送给他丰厚的年俸，条件是留在维也纳。同科学一样，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但音乐家却有他的祖国，贝多芬留下来了。

不幸的是，这几个贵族并没有完全履行诺言，他们不久就停止付给贝多芬年薪。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也七零八落，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从此他更孤独了，更落魄了。他在笔记中写到：“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贝多芬的生活是悲惨和不幸的。

耳聋给贝多芬的音乐事业带来了巨大困难。在费德里奥预奏会上，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预奏。显然，他听不清台上的歌声，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歌手们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一片混乱。连续几次都是这样。毫无疑问，在他的指挥下是不能进行下去了。当他知道症结后，一口气跑回家，一动不动地倒在床上，一言不发。巨大的痛苦无情地折磨着他。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挥不起指挥棒意味着什么啊！贝多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指挥棒。

与此同时，缺钱的烦恼一直困扰着他，把他弄得疲惫不堪。他的老朋友斯普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仅仅是因为靴子穿洞之故。他经常对出版商负着重债，那些以后名扬天下的作品在当时却卖不出钱。《D 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的全部美妙的奏鸣曲——每曲都得花费他好几个月的工作，可只给他挣了少得可怜的钱，可恶的钱！他用血泪写成的四重奏，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却一文钱都未曾拿到。这一切把贝多芬煎熬完了。

他虽然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但死神还是来了，慢慢地走近了这个傲视一切的老人，严格地说他还不是老人。上帝正在向受尽苦难的他伸出邀请之手。1826 年 11 月终，他得了肋膜性感冒，他病倒了。仅仅三个月时间，运动家般的体格就让病魔给压垮了。

“喜剧终场了”，这是音乐家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终场的真是喜剧吗？

贝多芬总是抱着一股炽热的感情，爱上这个或是那个女人。这些爱情好像永远都是非常纯洁的，没有半点的杂质。

他的热情与欢乐之间毫无连带关系。他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厌恶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这样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欺骗、作爱情牺牲品的。他不断钟情，如痴如醉，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是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探寻到的；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01 年，贝多芬爱上了琪丽哀太·琪却尔第。他为他心爱的人儿谱写了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现在我的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他满怀热情地向朋友如此表达欣喜之情。爱情点燃了他的生命之火。遗憾的是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爱情的细言软语，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废，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钟爱的人。风骚、稚气、自私的琪丽哀大使他苦恼不已，火热的爱如同划破夜空的一颗流星，炽热地燃烧过后，给贝多芬的内心世界留下的却是一片黑暗、悲哀和破碎……

上帝总喜欢捉弄不幸的人。上帝慷慨地给了贝多芬绝世无双的音乐天才和高尚的胸襟。可是他的外形却粗短、墩实，甚至于丑陋。而且他总是与金钱和地位无缘，他的一生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他的这一切也注定了他的悲剧：上帝在他的血液里灌满了对美丽女子最丰富、最热烈的爱欲冲动，却没有同时赋予他吸引这种女性的全部男性条件。

琪丽哀太离开贝多芬不久，贝多芬又喜欢上了丹兰士·德·勃伦施维克。她出身匈牙利的贵族的家庭，她很漂亮。贝多芬是他的音乐老师。有趣的是丹兰士小姐恰好是琪丽哀太的表姐。贝多芬的音乐天才吸引了这个贵族小姐。尽管双方发现对方较晚，但毕竟相会了。

丹兰士是位多才多艺的女性，擅长绘画。她曾把自己的一幅肖像画赠给贝多芬。题辞是：“给稀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新的爱情给贝多芬带来了新的生命，带来了艺术的智慧之光，它写了一首两个乐章的短奏鸣曲——《丹兰士奏鸣曲》，这首奏鸣曲化成了宁静、眷恋和千种风情，《丹兰士奏鸣曲》的旋律给人一种春光明媚、杏花疏影的诗意感觉，爱情是贝多芬人生沙漠中的一汪清泉。

丹兰士老早就爱上了贝多芬，但是他暴烈、多病、憎恨人类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绝望，爱情之火熄灭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谁都没有忘却这段爱情。贝多芬一直没有忘记丹兰士，可以说在贝多芬漫长的罗曼史上，丹兰士是他唯一的不朽的爱人，直到两人分手多年后，他仍然深深地爱着她。“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然和第一天见到她时一样跳得剧烈……”他还制作了六阕《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贝多芬晚年时，一位朋友无意中看到这位老人独自拥抱着丹兰士的肖像画，哭着，自言自语着：“你这样地美，这样地伟大，和天使一样。”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

在西方大作曲家的生活和创作中，爱情总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贝多芬同女性的关系尤为突出，且别具一格。柔美、纤细而体弱的苗条女性对贝多芬具有无穷的魅力。贝多芬的恋爱对象大多是他的学生，且都是漂亮的贵族小姐。贝多芬为他的情人们谱写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一直流传后世。

对爱欲的渴望，对大自然的爱，这两种感情在贝多芬音乐中总是浑然一体，息息相通的。善良、美丽的永恒的女性成了贝多芬音乐艺术创造的源泉，成了他追求美的王国和理想人格完成的引导者之一。离开了这些美貌的小姐，贝多芬的创作源泉会受到限制的。

贝多芬脾气暴躁，性格傲慢，尤其是生活上的落魄，感情上的失意，令他性情极其乖张，随着岁月的消逝，他愈加愤世嫉俗了。

他常常会勃然大怒，悔恨交加。有一次猛烈地爆发一阵后，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最亲爱的，最好的朋友！我在你面前表现得多么不成体统！我承认我不配赢得你的友谊。但是感谢上天，我并不是故意或存心对你那样出言不逊，是不可饶恕的轻率使我看不到事物的本质……”

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贝多芬不是天才，只是个怪物，是个疯子！他对朋友怒声斥责，对仆人们摔掼书本，甚至当面冒犯他的庇护人。作为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艺术家，他的生活要依靠“善心的”权贵们给予施舍，冒犯庇护人意味着他有失去生活来源的危险。有一天晚上，他到西里西亚李希诺夫斯基王子的城堡去，发现里面住了一群法国军官，贝多芬对拿破仑的士兵极其反感，这些军官是侵犯西里西亚的拿破仑的爪牙，看到侵略者成了王子的座上

宾，贝多芬不禁满面怒容，热情的法国军官们恭敬地请伟大的音乐家给他们表演，贝多芬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城堡的主人兼他的庇护人李希诺夫斯基也要求他演奏，他以玩笑的口吻说：“你要么为我们演奏，要么就像个战俘似的被监禁在城堡里。”狂傲的音乐家气得浑身发抖，一言不发地冲出了城堡。他在倾盆大雨中步行了几公里到了另一个村子。在等邮车时音乐家给王子写了一封著名的信：“王子！你之成为王子，靠的是机会和出身。我之所以成为我，靠的是我自己。世上有的是王子，将来也还会有千百个，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贝多芬！”这就是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

作为老师的贝多芬，有时出言尖刻，他对一个学生说：“你得老老实实地给我练琴，我的少爷。要练很长时间你才能意识到你根本就不能弹琴，这是高雅的艺术，不是玩网球。”就是在女学生面前也是如此。他的学生埃特曼男爵夫人曾这样说他：“狂暴么！是的，但那是一座火山的狂暴与火焰，是大自然本身的伟大力量，因为他的心里有一个巨人。在我上课的时候，他会把乐谱撕得粉碎，踩在地上。”伟大的贝多芬的确与常人不同。特殊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他这种独特的性格。

歌德是很受贝多芬推崇的，但对于这个世界，德意志的这两位巨人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据说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一道走过泰普里茨街，遇见皇室的人，这里面有奥地利的皇后和一大批公爵，谦恭的歌德顺从地站到路边，脱下礼帽，向贵族们深深地鞠躬。贝多芬却头戴礼帽，背着手，满不在乎地从皇家人士中间走了过去。事后，贝多芬这样写道：“君主与公卿尽可以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以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是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越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就看到了，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了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按帽子，扣上外衣扣子，背着手，朝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尔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些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旁，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有人认为，歌德的哲学是奴隶的哲学，而贝多芬的哲学是自由人的哲学。但如果说歌德的恭顺不是更理想的哲学，倒不失为一种比较实际的哲学，他处事谨慎，过着安逸的生活，而贝多芬则恰恰相反。尽管贝多芬的言行古怪异常，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把金钱只看成一种方便的东西，可能用来帮助每一个处于困境中的朋友，有时，他甚至用一部分作品去周济朋友。

贝多芬著名作品是特定的时代产物，是在许多音乐家作品上的升华。

18 世纪下半叶在欧洲，思想上和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法国启蒙运动反对封建特权，提倡回到自然和合乎人性；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反对封建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和创作自由，这些都对音乐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来依附于宫廷的音乐家，为了摆脱封建贵族的奴仆地位，成为独立自由的艺术家而进行不懈地奋斗，并将原来作为封建贵族娱乐品的声乐和器乐，提高到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丰富的感情内容的艺术作品。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德意志产生了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对以音乐形式和内容的革新有杰出成就的大作曲家，他们都在维也纳度过创作的成熟期，而他们的作品又都成为后世音乐的典型。因此，以他们为代表的作曲家被称为“维

也纳古典乐派”。

格鲁克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先驱，他开创了古典乐派的先河。此人在 20 多年里写了 20 多部意大利式的音乐剧和多部法国式喜歌剧。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日趋程式化的意大利歌剧所进行的改革。为了体现戏剧的真实性和真挚淳朴的表情，他扬弃了以炫耀技巧为能事的传统意大利歌剧程式，力求音乐与戏剧的统一。他的改革是卢梭“回到自然”和狄德罗“以自然为师”的美学观在音乐上的反映。

接过格鲁克接力棒的是海顿。这个“交响曲之父”、“弦乐四重奏之父”是个宫廷乐长，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奥地利各民族的民间音乐。海顿在原来以风俗性为主的器乐作品中注入了戏剧性和标题，并用独特的手法塑造出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他用交响曲的戏剧性体裁来反映社会现象，这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海顿之后是莫扎特，他被称为“神童”。17 岁时就成了很出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他的作品遍及各种体裁，尤以歌剧、协奏曲和交响曲为最重要。他的作品往往显示出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锐气和毅力，洋溢着“狂飙突进”的精神。莫扎特短短的一生共写了 50 部左右交响曲。最重要的 3 部是在 1788 年夏季的一个半月写出来的。3 部交响曲表达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天真无邪的欢乐情绪、真挚动人的抒情气质和刚毅豪迈的英雄气概。可惜，莫扎特只活了 35 岁，英年早逝。但他那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激励着后辈们，尤其是贝多芬将它继承并发扬光大。

格鲁克是乐坛上的修辞家；海顿是数学家；莫扎特是诗人；贝多芬是哲学家。

在整个西方音乐史上，贝多芬是一位乐圣；是一位浪漫派、古典派相融合的艺术大师。

他立意高远，取径宽广，博取了巴赫、莫扎特和海顿等伟大先辈的艺术成就，以采其华、穷其超、极其变，功深日远，渐次铸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骨力，形成了自己的特有风貌，把德国古典音乐推向至高的境界，同时又开创了德国浪漫派音乐的先河。

20 到 32 岁是贝多芬的早期创作阶段。一般来说，这个时期的作品不论在风格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没有跳出巴赫、海顿、莫扎特的传统。

贝多芬极力推崇巴赫，认为没有“德国音乐之父”巴赫，就不可能有贝多芬。

巴赫作品于贝多芬，乃是不断发现、赞叹和钻研的源泉。比如，贝多芬 13 岁时创作的一些赋格曲和前奏曲，便直接受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的影响。早年贝多芬刚到维也纳闯天下，开始征服西方世界乐坛的时候，苛求的音乐首都人首先欣赏他手指下的东西，正是他那完美无缺地演奏巴赫《平均律钢琴曲》的灵气、理解力和技巧。

贝多芬曾求学于莫扎特和海顿。“天才”莫扎特给贝多芬以深刻的影响。莫扎特一生写下的 20 多首不朽的钢琴协奏曲所达到的高超艺术境界，预言了后来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和《第五钢琴协奏曲》的咄咄逼人的雄风。同样，莫扎特在交响曲方面的艺术成就孕育了贝多芬的交响曲——空前绝后的伟大灵魂。莫扎特对贝多芬的影响是巨大的。

贝多芬从海顿那里学会了对位法和根据主题来作曲。26 岁的贝多芬写的三首钢琴奏鸣曲就有不少海顿的影响痕迹。

《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都是早期的代表作，贝多芬青少年时代的蓝色梦幻、光辉的理想同一种毅力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

33 到 47 岁是贝多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创作时期。《英雄交响曲》即《第三交响曲》则是新时期浪漫音乐的开端，这部作品是贝多芬的第一个“自身反思”，是他第一次“走入自身之内”的见证。《英雄交响曲》成了贝多芬精神世界的表述，成了他自身存在的反思。

被西方许多音乐评论家交口称赞的三首弦乐四重奏是这个时代的作品。这三首曲子是“一扇神秘的幽门，它一直通向贝多芬迷宫最深邃的内部”。这个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如《田园交响曲》、《命运交响曲》以及《第五钢琴协奏曲》和《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也都是从贝多芬灵魂最深处涌现出来的旋律。

贝多芬在交响乐领域里，大大超越了前人，成为“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并向“绝对精神”挺进，向“认识的王国”挺进。

《第四交响曲》创作于 1806 年，贝多芬此时正沐浴在爱情的阳光下，丹兰士小姐的温情融化了作曲家心头的坚冰。作品充满了轻快、明朗和幸福感，爱情的潜流在作品里潺潺流淌。

《第五交响曲》（即《命运交响曲》是这个时期贝多芬的创作最高峰，贝多芬将烦恼、苦闷、压抑和孤独感一古脑儿地倾泻在五线谱上，莎翁的悲剧向我们暗示有一个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存在，它就是命运。每个人对命运的理解和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不同的：懦夫屈于命运而不思抗争，英雄则公然与命运对抗，《命运交响曲》用它的旋律教会我们获得一个洒脱的人生，鼓舞我们站起来与困境拼搏。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这两部作品是姐妹篇，都是以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主题。作品中充满了清新、可爱和逗乐的情趣，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高尚情操。

贝多芬一生饱经荆棘、苦难和痛苦。1814 年他迎来了身处逆境后扬名四海的无比光荣，全欧洲把他看成是自己时代最受欢迎的作曲家。“精神导师”和“平民百姓的陛下”成了他的封号。

晚年创作时期是在他 47 岁以后，在这最后 10 年里，贝多芬的疾病和耳聋严重加剧，创作风格更趋向内在化。此时，他的精神愈益向自身深入，并从一个更高的阶段开始，向“绝对精神”迈进。

晚年的贝多芬常在沉空守寂的孤境中安排思索，品味人生的甘与苦。作为古往今来第一位伟大的音响诗人的贝多芬，他那多愁善感、随触而应的天性，在艺术创作中得以一一流露、申诉和祈祷。

在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第九交响曲》为他提供了机会。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唱，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地扑向“欢乐”，把它紧紧搂在怀里……

《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的演奏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交响曲引起了狂热的骚动，许多人都哭了。《第九交响曲》使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自己的痛苦。

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的精神已经达到了“精神王国”，即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最后完成阶段——哲学。这便是意志在生存中表现它自己的东西。

如果说《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达到“绝对精神”最后完成阶段的一部作品，那么，《C 小调钢琴奏鸣曲》也同时宣布了终点的光辉到达。终点到达了，贝多芬的生命之花也开始凋谢零落了。

贝多芬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仅有几阵懒懒的微风，但是静止的空气里，已经有隐隐的威胁、沉重的预感。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英雄交响曲》和《命运交响曲》。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 1810 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日光变得异样。最清楚的思想，也看来似水汽一般在升华：忽而四散，忽而凝集，它们又凄凉又古怪的骚动，罩住了心。往往乐思在薄雾之中浮沉了一二次以后，完全消失了，淹没了，直到曲终才在一阵狂飚中重新出现。即使欢乐本身也蒙上了苦涩与犷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合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黄昏将临，雷雨也在酝酿着，然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夹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天空的夜色给赶走了。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1827 年 3 月 26 日，贝多芬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孤寂中离开了人世。死神割断了他的生命琴弦；一盏明灯熄灭了！这是一盏什么样的明灯啊！千百万个昏睡的大脑因他的音乐而苏醒，千万颗受了伤的心因他的音乐而愈合。**拉美反殖民统治的英雄玻利瓦尔**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西班牙统治者对拉丁美洲殖民地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广大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拉丁美洲掀起了波澜壮阔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反殖民统治的英雄，其中最著名的有圣马丁和玻利瓦尔。他们一南一北率领大军冲击着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

西班牙人以血与剑征服了南美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自然也就成了那些土地上的宗主国。既然如此，那么美洲的黄金白银成吨地运往欧洲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不过到了 18 世纪，崇尚理性的风气席卷了全欧洲，南美洲也受到了它的感染。人们普遍地开始思考人性的问题，美国通过独立战争找到了答案，法兰西在 1789 年革命中更是将自由之光照亮了世界。一时间，寻获自由与独立便在宗主国统治的地区聚成了一股潮流。在南美，玻利瓦尔是树立这面旗帜的第一人。

西班牙人在南美广大殖民地建立了帝国行政机构，建筑教堂，并经营牧场和矿山，实行控制；并用舰载大炮和带滑膛枪的士兵把南美洲的金、银等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西班牙去。

经过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在南美洲殖民地居住的更多的是混血人，尤其是委内瑞拉。还有为数众多的土生白人，所谓土生白人即在殖民地出生的、其祖先是白人的白人，他们在殖民地享有至高地位，与从宗主国派来的

监督的官员、军队居于统治地位。

土生白人对宗主国的统治开始不满，他们要求独立，进行政治和思想上的改革。在反对宗主国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土生白人成为骨干力量和领导者。

1783 年 7 月 24 日，西蒙·玻利瓦尔出生于加拉加斯。加拉加斯是一个简陋的城市，是统管委内瑞拉各省的首府。

玻利瓦尔出生时，其家族已是地位显赫了，他们通过不断的联姻关系与加拉加斯最早的征服者和定居的家族结合在一起，而在加拉加斯有极大的势力和影响。但可惜玻利瓦尔在 2 岁半时丧父，9 岁时又丧母，而成为孤儿，于是便被置于监护人的护理下。他受到了当时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洲富家子弟的最好的教育。其中，对玻利瓦尔起影响最大的还是西蒙·罗德里格斯先生。

罗德里格斯先生在西班牙极负盛名，他对于社会改革有一些异乎寻常的见解。尽管在那个时期，欧洲正在休养生息而其他国家的人民只想从欧洲学习各种思想与制度，罗德里格斯却大胆地写下了这样的意见——欧洲是无知的，不是在文学、科学、艺术和工业上，而是在政治方面，漂亮的面纱掩盖着旧世界最可怕的贫穷和丑恶的面貌。这是多么伟大的预见啊。因为正是一个世纪以后，这种贫穷和丑恶造成的恶果才开始显露出来，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社会隐伏着危机。

在罗德里格斯老师的巨大影响下，在玻利瓦尔心灵的深处唤起了对自由、正义及一切伟大和美好事物的向往。他坚信：成功之路在于不断改革。而这正是他后来能够坚持不懈、勇敢顽强地为了拉丁美洲的解放而斗争的原因。

1799 年 1 月 19 日，玻利瓦尔离开加拉加斯，乘船经墨西哥和哈瓦那，到达西班牙马德里城，投靠他的舅父埃斯特万。

1802 年 5 月 26 日，他在马德里与特蕾莎·托罗小姐成婚，不久便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加拉加斯。

如果说第一次欧洲之行并没有使他确立政治志向，那么他的第二次欧洲之行则履行了上述使命。

特蕾莎的死给玻利瓦尔以沉重打击，以至于使他对早已作了周密安排的留在委内瑞拉的计划都感到憎恶，于是他再次前往欧洲。这次与第一次有很大不同，第一次，由于年轻且没受过足够教育，而且又很早就谈上了恋爱，因而其精力几乎全部用于照管自己及考虑成家立业。而这一次，生活中出现的空白使他一下子得到了某种解放。他先到西班牙，又从马德里去法国和意大利，这时，他开始关心政治事件，并渐渐投身于政治活动。

就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很有刺激的事。他同洪堡有一次谈论西班牙的殖民地南美洲有可能会独立的问题，这位学者对他说：“我认为您的国家条件已成熟，但是我没有发现有能力完成这一大业的人。”这可能就是促使玻利瓦尔投身于解放南美洲这一伟大事业的契机。

1805 年 8 月，玻利瓦尔同罗德里格斯及特蕾莎的堂兄弟前往意大利。在这次旅途中，玻利瓦尔向两位伙伴郑重发誓要为南美洲的独立而献身。1807 年玻利瓦尔到了美国。美国的民主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这样的事实：共和政权开辟了一种新的精神面貌，社会下层能在不发生暴力和混乱的情况下，有机会参与领导国家，获得物质利益或赢得名望。美国的民主制

度给玻利瓦尔的影响是巨大的。玻利瓦尔投入反殖民统治的斗争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1807 年，玻利瓦尔回到加拉加斯，此时那里的人们正在热烈谈论着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将军为解放祖国而从西部登陆未获成功的那一事件。

米兰达出生于 1750 年 3 月 28 日，也是加拉加斯人。他早年离开委内瑞拉到西班牙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在 1780 年，西班牙联合法国为帮助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取得独立，而在加的斯组织了赴北美作战的远征军，米兰达积极地参加了。就在他为了美国的解放而战的时候，他开始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不满，决心用武力争取南美殖民地的独立。

1790 年 2 月 14 日，他去英国寻求帮助，会见了首相皮特，介绍了他的解放南美洲的计划：米兰达计划在南美成立一个除巴西外以密西西比河到合恩角的新国家，并希望英国能在海上牵制西班牙的力量，等新国家成立后再对英国偿还援助……但是他失败了。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米兰达又前往法国。在那里，他以陆军中将的身份为了捍卫法国人民革命成果而斗争，一直到 1793 年 7 月被罗伯斯庇尔的公安委员会逮捕。

1798 年，米兰达离开法国，又回到英国，专心致志地筹划解放西班牙殖民地的事业。他向英国政府提出一个个办法，让英军在委内瑞拉登陆并鼓动委内瑞拉起义，但这又没有成功。于是 1805 年 11 月米兰达到纽约筹款购买物资，并招募了 200 余人组成远征军，于 1806 年从卡贝略港登陆进入委内瑞拉，但又被打败了。这次米兰达登陆计划虽然失败了，但在拉丁美洲广大地区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此时，玻利瓦尔已经成长为一名革命者了。祖国的政治形势成为玻利瓦尔所唯一全神贯注的问题，他从米兰达手中继承了解放拉美的伟大事业了。

1810 年 4 月 19 日，在加拉加斯发生了革命，成立了完全代表土生白人力量的新政府。一星期之后，加拉加斯的执行委员会就号召美洲所有的市议会像委内瑞拉一样行动起来。

专门主管外交的政府部门是由胡安·罗西奥博士领导的，在他指示下，新政权准备派出若干外交使团去争取外国支持，最重要的工作委派给了西蒙·玻利瓦尔，同他一起出使的有路易斯·门德斯和安德烈斯·贝略，三人一起前往伦敦执行任务。在伦敦，他们遇到了米兰达。

米兰达、玻利瓦尔和贝略这三位杰出人物的抱负使拉美新世界具有更多的新意。他们的活动时间顺序紧紧地前后相接；米兰达在 1810 年开始倡导自由，直至 1812 年失败，他始终是力主南美洲大陆统一、并策动南美洲革命之中心人物；1812 年玻利瓦尔作为思想家和领袖，以其《卡塔赫纳宣言》和首战胜利而初露锋芒；1830 年玻利瓦尔去世后，贝略开始了传播文明的工作，这一工作涉及面极广，具有长期影响。

对于玻利瓦尔和贝略而言，与米兰达会见必然会是一件震动他们思想的大事。米兰达和玻利瓦尔会谈了政治和将来如何执政的问题。米兰达刚刚 20 岁就率领他的连队跑遍了西班牙，西班牙的落后的政府工作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还曾不断地观察他到过的所有国家的政府工作，因而现在他滔滔不绝地发挥自己对市政、法庭监狱、矿业等等的见解与设想。而玻利瓦尔如饥似渴地听取其讲解。米兰达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玻利瓦尔等人。

1810 年 12 月，玻利瓦尔返回了委内瑞拉。此时，委内瑞拉决定使革命具有宪政的形式，最高执政委员会召集的议会于 1811 年 3 月 2 日开幕，7 月 5 日宣布委内瑞拉独立，1810 年 12 月，新国家的宪法得到通过。它明确规定了要进行共和和民主性质的革命，并且明确提出了“美洲各地方议会为建立美洲和西班牙邦联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的宗旨，因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委内瑞拉的独立行动引起西班牙当局的不安和恐惧。西班牙决定用武力来扑灭独立运动的烈火，恢复西班牙的统治。

西班牙摄政当局下令封锁其海岸，并控制了委内瑞拉西部和出海通道的科罗和马拉开波两城市。而东部的圭亚纳在其宣布拥护共和政权之后不久，便又落到了保皇派手里；最高执政委员会组织了一次由托罗侯爵率领的对科罗的远征，被驻守的西班牙都督打败了；而一支由海军中校多明戈·蒙特维尔德率领的西班牙正规军增援科罗的保皇派，并向内地开进……形势发展对委内瑞拉越来越不利。

更不幸的是，此时，共和国内部也正在瓦解，政府软弱无力，在群众心目中失去其应有威望，而且土生白人在获得领导权后，就矜持骄傲起来，当地贵族便抛弃他们。人们宁可要原来的君主政体也不愿他们得势，所以多数群众倒向保皇派。而最终造成了国家的失败。

共和国面对这种严重危急的局面，而不得不采取措施，米兰达取得了独裁权。米兰达面对严峻形势，他并未泄气退缩，而是极力想扭转局面，但时间已太晚了。

1812 年 6 月 30 日，玻利瓦尔驻守的要塞卡贝略港由于叛乱而失守。米兰达不得不让步了，他凭借手上仅有的兵力与蒙特维尔德谈判。7 月 25 日在圣马特奥签署了向保皇派投降的文件，新成立的共和国就这样被颠覆了。委内瑞拉独立运动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受到了挫折。

独立革命失败后，玻利瓦尔逃亡到了库腊索岛，又去了新格拉纳达的卡塔赫纳。在那儿，玻利瓦尔进行了反思，重申了南美大陆必须统一的思想，南美洲的解放和南美洲各国未来的命运要求所有的革命者永远抛弃利己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猜疑。同时，他又决心找出委内瑞拉革命失败的原因，以此作为教训提供给共和派。他分析的原因有：实行松散的联邦制，不能有效地调集军队抗击敌人；实行民卫部队制，既费钱又无效，缺少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正规军；政策过于宽大无边，镇压反革命不力……。实践证明，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并且成为日后解放者斗争的宝贵经验。

在新格拉纳达所处的短期内，他在军事上也取得了不小成就，几次要打败保皇派，并在库库塔战役获胜，而被提升为准将。

在那一时期，一位委内瑞拉上校给玻利瓦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将军，如果两个人就足以解放祖国的话，我愿意跟随您左右。”从而坚定了玻利瓦尔率军打回委内瑞拉的念头。因为此时他拥有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而且所有居住于新格拉纳达的委内瑞拉人，都公认他为领袖。于是他向政府提出要求。1813 年 5 月 7 日，命令下达了，但仅限于攻占解放委内瑞拉梅里达和特鲁希略两边境省份。5 月 18 日，玻利瓦尔率军占领了梅里达城。在梅里达城，玻利瓦尔首次被人们称赞为“解放者。”6 月 10 日，他们又打败了西班牙军，占领了特鲁希略城。

不久，玻利瓦尔统帅大军向加拉加斯进军了。准备同爱国者圣地亚哥·马里尼奥上校的部队一起，对西班牙军队进行东西夹击。8 月 7 日，玻利瓦尔

的部队进入加拉加斯城，蒙特维尔德逃到卡贝略港。8 月 8 日，玻利瓦尔便通报新格拉纳达说，委内瑞拉已获得解放了，剩下的事便是由他亲自来组织政府了。

为了巩固政权，玻利瓦尔首先实行军权与政权的分离，为此他把当初三人执政委员会中的克里斯托瓦尔·门多萨请回来任加拉加斯省长，而他自己则任共和军总司令，被授予了最高军事权力。

保皇派反对独立运动，委内瑞拉全国再次陷入了战争。由于外围的封锁，爱国者的军队总是缺少武器，而且他们还遭到了农民和奴隶的反对。

尽管爱国者军队打击保皇派，取得了几次胜利，但 1814 年 6 月 15 日的拉普埃尔塔的失败使共和国精疲力竭了。到了 1814 年底，整个委内瑞拉落入了保皇派手里。

玻利瓦尔又回到了新格拉纳达，受到了国民议会长的热烈欢迎。在 1815 年 5 月他又前往牙买加，呆了 7 个月，进行了阅读和思考。作为思想家，这段流亡时期他颇有收获，他那篇光辉的书信（《发自牙买加的信件》，对委内瑞拉及南美洲革命的经历与前途作了总结和估计）就是在金斯敦写的。

1815 年 2 月，西班牙又派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来镇压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为了援助被西班牙军队围攻的卡塔赫纳城，玻利瓦尔筹款购买了两艘战船，带着一部分人离开了牙买加。途中他们得知卡塔赫纳被西班牙攻破后，他们就驶向了海地。

由于玻利瓦尔坚信：“一个事要做好，就必须做两遍；就是说，第一次教会第二次。”所以，尽管他失败了，但是他仍然坚持斗争。

1816 年 3 月 31 日，玻利瓦尔组织了军队从海地城镇列凯出发，向委内瑞拉东海岸的玛格丽塔岛进攻。不久，他又转兵指向加拉加斯西边的奥库马雷德拉科斯塔，准备在那里登陆，但这些努力最终失败了，玻利瓦尔又逃到海地。海地总统佩蒂翁热情接待了他，并给玻利瓦尔提供了大量援助。玻利瓦尔凭借各方面收集来的人力和物力又返回了委内瑞拉，重新投入到拉美的独立运动中。

1817 年 1 月 1 日，玻利瓦尔又一次遭受了挫折。l 月 9 日他们在克拉林内斯一败涂地。于是，他又前往爪亚纳与皮亚尔会合。后来，为了维护政府的尊严，为了全体的安全，他不得不处死了皮亚尔。

总之，1817 年仿佛噩运跟定了玻利瓦尔一样，但他毫不气馁，后来，形势开始逐渐向有利于爱国者一面转化了。因为一是爱国者们得到了洛佩斯·门德斯招募的外籍军团的增援；另一是占据了阿普雷平原的割据者何塞·派斯承认了玻利瓦尔的权威，而把他的卡枪兵引入了爱国事业。到了年底，爱国者已巩固了对委内瑞拉东部的占领，并在南方控制了爪亚纳，还与西南方新格拉纳达的平原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了一个围困委内瑞拉中部的庞大的弓形包围圈。

玻利瓦尔在 1818 年初第三次进军加拉加斯，打败了莫里略而迫使他匆忙地撤向中部地区。在 1818 年末，玻利瓦尔在长期奋斗、重建共和国这一任务临近完成之时，做了两件大事：削平山头，消除了军事割据者各自为政的局面；重建了国家的法律制度。而且随着共和国威望的日益提高，原先站于保皇派的土生白人游击队越来越多地投奔到他的旗帜下来了。

此时，玻利瓦尔已能致力于从政治上和思想上重建共和国的工作了。在他的主持下，国会在 1819 年 2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他发表演说，全

面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呼吁人们放弃 1811 年的宪法，而不能维持那种松散的联邦制；设立软弱无力的多头执政机构；主张公民之间实行平等；同时他向立法者们疾呼为奴隶请命，要求让奴隶得到彻底解放；建议设立民选的众议院与世袭的参议院和一位由人民选举出的终身总统，等等

但这次会议上他遭到了拒绝，宪法否决了总统终身制。但不管如何，玻利瓦尔动摇了政治家们对宪法问题的习惯看法，没有建立三人执政制，抛弃了联邦制。

1819 年 6 月，玻利瓦尔统帅大军翻过了安第斯山，进入通哈省。他们在巴尔加斯沼泽地打败了西班牙殖民军。不久，玻利瓦尔又在博亚卡大获全胜，俘虏敌人 1600 多人。萨马诺总督逃离了波哥大，玻利瓦尔乘胜占领了波哥大城。

在波哥大城，玻利瓦尔就开始筹划向总督辖区的北部与南部开战。在北部，他准备解放新格拉纳达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对委内瑞拉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并攻占马拉开波；在南部，他要解放基多，远及利马，以图彻底完成南美洲的解放事业。把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旧基多检审庭辖区联合成一个国家。

由于在博亚卡的胜利，以及委内瑞拉的新格拉纳达的战斗成功，玻利瓦尔掌握了大片领土，两国的土生白人更多地投向共和派的旗帜下；而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却惶恐不安，尤其是 1820 年初西班牙的自由党人革命成功，而使得原来要派去重新征服南美洲的新的远征军无法出发了。

不久，莫里略受命代表西班牙与共和派谈判，并在 1820 年 11 月 25 日双方在特鲁希略城签订停战协议。此后不久，便发生马拉开波市民起义事件而使这个停战协议流产。1812 年 6 月在加拉加斯以西的卡拉博博平原，西班牙远征军遭到了沉重打击。这样，到了 1821 年底，除了卡贝略港与科罗省之外，整个委内瑞拉与新格拉纳达都获得了解放。西班牙殖地军的残余被歼只是时间问题了。

1821 年 8 月 30 日，哥伦比亚共和国宣布成立了，玻利瓦尔任总统，桑坦德任副总统。玻利瓦尔又一次坚持军权与政权分开，而让桑坦德领导政府，自己全权指挥军队。但玻利瓦尔对库库塔宪法深感失望，因为它没有考虑本国问题的社会背景，而是限于用宪法的老生常谈来掩盖问题。

建立哥伦比亚共和国之后，玻利瓦尔一心一意要向基多与秘鲁进军，因为他的行动服从一个信念：只要西班牙人在美洲有一个重要的据点，那么整个大陆的独立都将受到威胁。

1820 年 10 月 9 日，基多以南的瓜亚基尔正式宣布独立。但这个城市仍与哥伦比亚等地方隔绝着，因为基多的北部和新格拉纳达南部都在保皇派手里，为此玻利瓦尔接受苏克雷的建议，派他率远征军从海路前往征伐瓜亚基尔，从南部进攻基多。1822 年玻利瓦尔率军再次越过安第斯山，5 月 24 日皮钦查的决定性胜利，使爱国者攻占了基多。

1822 年 7 月 11 日，玻利瓦尔到达瓜亚基尔，在那儿他与圣马丁进行了会晤，就一些与南美洲解放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议，并最后就军队指挥权达成相同意见，即由玻利瓦尔统一领导军队，解放保皇派占领的地方，而圣马丁则将在欧洲引退。

1823 年 8 月 7 日，玻利瓦尔启程去秘鲁，并于 9 月 1 日在卡亚俄登陆。

1824 年，玻利瓦尔指挥胡宁战役获全胜，从而使玻利瓦尔离他的目标更

近了。

1824 年 12 月 9 日，苏克雷率领南美独立军队在阿亚库巧决战中彻底打败西班牙殖民军，取得了反殖民统治斗争决定性的胜利。

胡宁与阿亚库巧两次战役使秘鲁取得了全国解放。1825 年 2 月，玻利瓦尔被授予终身总统的荣誉和“秘鲁之国父与救星”的称号，并把特鲁希略城命名作“玻利瓦尔城”。

1825 年 4 月，玻利瓦尔动身去南方各省作一次巡视，他想借此机会看一看这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并进一步开展他一到秘鲁就开始进行的整顿政府的工作。而苏克雷指挥军队扫荡残余西班牙军队，并在上秘鲁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为纪念玻利瓦尔为秘鲁独立解放事业所做贡献，而把它命名作玻利瓦尔共和国——在不久就改名作玻利维亚。

玻利瓦尔通过 10 多年的艰苦征战,终于在南美洲打破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一系列独立的国家。

西蒙·玻利瓦尔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更在于他为重新组织社会所作的贡献。为了南美洲殖民地国家的富强和发展，他终生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南美政治实体。尽管他最后失败了，但南美人民永远记住他。

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

如果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新世纪黎明的曙光的话，那么，18 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则足可宣告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已在欧洲大陆形成。它犹如一阵旋风，无情而有力地扫荡着帝制时期所遗留的一切残渣余孽，将民主、自由与博爱的种子播入民众的土壤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摧垮了一个专制的王国，建立了与之完全两样的政体；它将一面人权的旗帜高悬起来，与统治了人民近千年的贵族特权作彻底的决裂；它将旧王国的统治者推上了绞刑架，让人民对他作出历史的判决。两个世纪过去了，但它在西欧乃至世界史上所留下的痕迹仍是那样深刻，那样清晰可见。

1788 年 6 月，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爆发了一次市民与国王军队的激烈冲突。当时法国著名作家斯丹达尔把这一事件称为“法国革命引起的第一次流血事件。”史学家们后来称之为“瓦块战斗日。”这一名字的由来据说是在那次暴乱中，王家海军士兵擅自向徒手的群众开枪，暴动者就以屋顶上的瓦块为武器进行还击。事件最终结束在一片纵酒的欢声中：兴高采烈的市民们在街上列队前进，鲜花、焰火相映生辉，犹如一派节日景象。这样戏剧性的结尾令人们大为惊异，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暴动预示着暴风雨就快到来了。

由于王室挥霍无度，财政连年入不敷出，国王被迫向特权等级增加税收，其中有土地征税法案。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大理院的激烈反对。法官们拒不登记有关法令，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以打击王权。于是，作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再也难以忍受这一挑畔了，路易十六立即颁布敕令，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大理院的。敕令的内容包括改组司法机构、设立新法庭，从而削弱贵族法院的力量。这无疑威胁到法官的特权，尤其是敕令取消了大理院的提异特权。敕令引起大理院的愤怒，法院的长官除了继续谋取利益外，还使一大批法院工作人员，包括检察官、律师和传达员等得以谋生。此外，他们向市民宣扬大理院对格勒诺布尔市民生活的重要性。后来，他们进一步煽动、指责新设全权法院没有包括第三等级的代表。于是，一种情绪迅速地在整个多菲内省弥漫开来，群众站到了大理院的法官们一边，成为他们的支持者。暴动的气氛渐趋炽热。巴黎来的命令授意驻军司令可以使用密札流放大理院成员。但这一命令并未保持秘密状态而很快就在市民们中传播开来。6 月 7 日晨，检察官、律师等司法人员纷纷来到首席院长的府第。商店相继关闭，街上人群越聚越多，密探也出现于近郊。中午，一群妇女在钟楼上敲响警钟，一场流血的骚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格勒诺布尔市事件不过是法国革命前政治、经济危机聚积到顶峰时期火山即将喷发的一个预示罢了。法国国王将土地层层分封，自己高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广大的农民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整个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再分成许多阶层，人民备受专制压迫与社会不平等之苦。贵族又分成几类，高级教士属于贵族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大多出身贵族，拥有大量土地，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另一类是宫廷权贵，他们上承王恩，实际上是靠人民供养，他们被任命为某几省的军区长官或高级军职；此外还有暴发户新贵族与执掌司法大权的穿袍贵族；最后一类是地主贵族，他们利用封建私法，对农民实行盘剥。僧侣分成两个阶层，即如前所述的收入丰厚的主教和穷苦的布道传教者。后者大多出身平民，他们居住乡下，与人民接近，因而对第三等级抱有同情心。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占有绝大多数，他们要向地主缴纳

贡赋或地租，向国家缴人头税和土地税，此外还须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他们的生活极端贫苦，因而日后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第三等级中还包括城市平民。城市贫民同样深受特权等级的压迫和歧视，而且负担着沉重的苛捐杂税。有人称他们为“无套裤汉”，也是后来革命的主力。当时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由于尚未获得政治统治权而属于第三等级的范围。他们在第三等级中影响最大，成为法国 1789 年革命的领导者。这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既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而且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其中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他们的观点与著作成为了日后推进革命进程的精神力量。

由于法国封建统治者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法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摩擦日趋激烈。国家财政极度紧张，统治阶级内部四分五裂。此时，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贵族经济学家杜尔阁担任财政总监时，为了缓和财政上的危机，曾下令取消行会，允许粮食自由买卖，甚至要求国王与特权等级也纳税。这种作法的结果导致了他两年后被免除职务。他的后任内克也遭受了与他同样的命运。1788～1789 年，法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与此同时，政府 1786 年同英国签订的通商条约，允许大量英国产品流入法国市场，其后果是法国本国工业被排挤倒台，大批工人失业。

法国人民再也不堪忍受贫困的折磨了。许多地方的农民、工人和城市平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国王为了继续自己的统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召开了三级会议来解决财政危机。

1789 年 5 月 5 日，国王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召开了三级会议，在会议中，路易十六只强调国库空虚，要求各等级协调一致，解决财政赤字；提醒大家要提防革新运动。而对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只字不提。他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同国人公开对抗，自愿与人民为敌。

在人民的支持下，第三等级的代表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6 月 17 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自己是代表全体国民的国民议会，并下令废除一切捐税。这一果断的行动是走向废除君主政体的第一步。同时这些措施也得到了全国国民的热烈拥护。

但国王采取了危险的作法，他悍然下令封闭国民议会会场，禁止开会。国民议会则针锋相对，代表们在一个网球场庄严宣誓：非待产生法兰西宪法，决不解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僧侣的大多数，在一场最富于爱国精神的迁移过程中，加入了国民议会。国王的恫吓产生的结果与他原来的意图背道而驰。现在他唯有调来军队作最后一搏了。7 月 9 日，国民议会改名为制宪议会，代表们上书国王，幻想用合法手段来制定宪法。军队终于开来。7 月 11 日，国王撤换了各部大臣，一些主张改革的人都被免职，路易十六意欲和人民顽抗到底，而人民也只有以暴力方式推翻专制政体，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三级会议不但没有解决各种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国王路易十六要用武力来镇压人民，而人民被迫起来进行武力反抗。因此，三级会议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

1789 年 7 月 12 日，巴黎市民得知前财政总监内克被罢官并已被流放国外的消息，认为这是一桩阴谋。于是，成千上万的人迅速行动起来，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支持内克。但游行队伍遭到了政府骑兵的镇压，多人受伤。一时间，巴黎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7 月 13 日，巴黎响起了警钟，起义走上了正轨。当天在市政厅里，资产阶级的选举人迫使旧政府同他们共同组成新政府——常设委员会，处理公安问题，并且组织了国民自卫军，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兵组织，它的主要成员是城市平民。1789 年 7 月 14 日是法国历史上一个光荣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斗志高昂的群众涌向巴士底狱，向这所象征着封建统治的保垒发动了进攻。经过激烈战斗，起义者冲进了监狱，处死了里面的守军司令罗奈。人们在废墟上立起一块牌子，上面写道：“这里埋葬了巴士底狱”。战斗的胜利使巴黎全城沉浸在喜悦之中，人们整夜狂欢，庆祝胜利。面对巴黎人民声势浩大的起义，国王及其大臣们惊慌失措。国王被迫作出让步，下令军队撤离巴黎和凡尔赛。他回到凡尔赛宫，承认了革命。路易十六的行为获得了起义者的谅解。而那些反对革命的大臣们和所有搞阴谋未遂的人都离开了宫廷。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和他的两个儿子夕孔代亲王和孔蒂亲王、波利尼亚克一家，带着仆从逃离了法国。他们在都灵住下，不久便在国内挑起内战，并联合其他专制国家组织欧洲反法同盟。

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法兰西。各省纷纷组织市政府实行自治，成立国民军用以自卫。权利和武器从专制者手里转移到人民手中。在广大农村，旧日统治者们的堡垒被人们烧毁；被领主们视为珍宝的地契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旧秩序被推翻，等级不再存在，专制制度被取消。现在人们在考虑如何废除各种特权了。

7 月 14 日后，大资产阶级夺取了领导权，他们要领导革命，必须对付农民的起义力量。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增强了农民废除“封建权力”的愿望。对农民而言，废除“封建制度”，就是要首先摆脱世世代代强加于他们头上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虽然农民的成份是复杂的，然而人们在谋求共同目标的运动中取得了一致的团结。有人认为农民袭击城堡的目的在于销毁领主的租税帐簿和其他证明领主身份的证明，同时也是为了夺取领主们的粮仓。因为在暴力事件中无土地的农民占有一定比例，这就构成一种威胁，为反特权阶层而建立起来的、由有产者和贫民结成的联盟有可能土崩瓦解。为了消除这一威胁，议会向人民发布了关于恢复秩序的公告。8 月 4 日晚，议会又发出了信号：他提议对封建特权进行赎买并废除人身劳役。这个提议是使一切特权等级作出牺牲的开端，他们争先恐后竞相提出献纳和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在当晚的国民会议上，讨价还价的嘈杂声响成一片，要求让步的呼声席卷了大厅，淹没了全场。贵族和主教们在将自己的非法所得捐献给整个民族后，不由得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声：别了，财务方面的特权和赋税方面的不平等！别了，对狩猎的垄断权！别了，领主裁判权！别了，圈地权！别了，塔式鸽笼！……

8 月 4 日之夜是扫除封建残余的一夜，人民在一夜间夺回了久违的平等权利，它将奴隶制度送入了坟墓，把平民的所有权从占夺猎物、强征什一税中解放出来，把土地从贵族领主的所有权中解放出来。这一夜改变了法兰西的面貌，国家制度由以前一切属于个人变为了一切属于国民。革命使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正象起义使人民成了政府的主人一样。历史学家曾评价说：“也许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曾有过如此的壮举。人们竞相为民族而奉献、捐赠和慷慨解囊……多么难忘的伟大夜晚！人们激动得落泪，紧紧拥抱！多么伟大的民族！作为一个法兰西公民是何等光荣和自豪！”7 月 14 日是一场伟大的革命，8 月 4 日则是这场革命的继续。它使力量变换了位置，初步

的变革全部完成。同时为新宪法的制定提供了可能。8 月 4 日，法兰西人是不会忘掉这一天的。

1789 年 8 月，制宪会议颁发《人权宣言》。宣言公布了为后人称颂的“ 不朽的原则 ”：自由、平等、安全和反抗压迫，信仰、思考和表达信念的权力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力；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三权分立等等。这些思想自从出现一直影响着后世。

《人权宣言》的宣布使法国在世界各地树立了威望，从长远意义上来说，它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历次战役，在今天的法国人看来，《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好象征。

对于全体热爱自由的法国公民来说，《人权宣言》无疑是一个新的福音，是人民幸福的源泉。有人评论说：“ 昔日的立法者为共和国做了一切，而法国则为人类做了一切 ”。

当然，宣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就其内容来说，它未将一位名叫西哀士的议员的提议定为律条，西哀士的条款是：“ 任何不能满足其自身生活需要或无法找到职业之公民，如服从社会之安排可享受社会救济。 ”这一条直到 1848 年才成为劳动法的基本条款。然而如同大多数人的认识那样，宣言所包含的平等精神是不朽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令所有的专制制度胆战心惊。它代表了一种在任何地区都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普遍原则。《人权宣言》与“ 人类的利益太息息相关了。 ”

随着革命的发展，法国各派反动势力也加紧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宫廷贵族、内阁、地方教会和部分军官都反对革命。他们视革命为洪水猛兽，必除之而后快。此外，市场萧条、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物价上涨，形势很严峻。革命派只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既粉碎敌人的进攻，又稳定混乱的局面，才能将革命坚持下去。在当时，唯一的办法是没收和出售教会的财产以减轻国家负担，这样不仅可以掌握一个巨大财源，而且可以取得重大的政治成果，使顽固与革命为敌的教会失去它的物质后盾。1789 年 12 月 29 日议会公布法令，将教会的财产管理权转移到市政府手里。这样一来，僧侣们就誓死与革命为敌了。他们与反对派贵族勾结起来，用他们所有力量阻挠革命。敌人的目的在于分裂议会，以图反扑。与此同时，议会外面的反革命阴谋也层出不穷，有人企图挑起军队叛乱。僧侣在朗格多克发动了暴乱。但这些活动最后都被镇压下去。

国王路易十六想假手各种反对力量，恢复它业已失去的天堂。他暗地鼓励种种反革命活动。自己却躲在幕后。因此，他只煽动反抗而又不公开参加反抗。宫廷同某些人一起怀念旧制度；又同另一些人共谋缓和革命。宫廷的这种两面三刀的作法为自己的最后覆灭埋下了祸根。

尽管处境维艰，议会仍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制宪的工作。到 1791 年 9 月，制宪议会终于制定了一部宪法。1791 年宪法是根据适应法国的思潮和局势的原则制定的。当时掌握实权的中产阶级在议会中占多数，这部宪法实际上是中产阶级的产物。这一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进一步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同一等级的政权机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进一步赋予公民平等、自由的权利，等等。

为了恢复失去的权力，路易十六决定逃亡国外，纠集反动力量卷土重来，镇压革命。1791 年 6 月 20 日，路易十六及其家族秘密作好一切准备后，登上马车，朝夏龙和蒙梅迪的方向出发。国王潜逃的消息使人们惊讶和愤怒。

人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法国旧制度复辟的危险，乃至可能爆发一场长期的内战。幸运的是，路易十六在逃亡的第二天就被人认出来。他在瓦伦被扣留，后被监禁起来，两年后被推上了断头台。

法国革命如同地狱的烈火，眼见就要将统治这个国家近千年的专制制度吞噬，并且它的影响势必蔓延到它四周的地方。法国革命必然要改变欧洲的政治布局：国王与国王之间的斗争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国王与人民之间的斗争。

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奥地利、英国和法国一直是欧洲的三大强国。奥地利和英国由于有利害关系而结成同盟，反对法国。三国为了扩张势力和贸易竞争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法国联合了西班牙、瑞典、波兰和土耳其以及普鲁士、那不勒斯王国与英奥集团对抗。18 世纪后半叶，北方兴起了普鲁士和俄国两个强国。俄国和普鲁士在 1772 年第一次瓜分了波兰。两国又于 1786 年结成了同盟，瓜分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俄国、普鲁士的扩张行为威胁到英国的利益，其中俄国的威胁是首位的。为了遏制俄国，英国同普鲁士、荷兰结成同盟。1790 年 2 月，正当战争要爆发时，普鲁士国王约瑟夫去世。于是在英国、普鲁士和荷兰的调解下签订了奥士和约。俄国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在英、普的压力下，也于 1791 年在雅西签订了俄土和约。这些和约的签订，结束了 18 世纪欧洲的政治纷争，现在各强国完全有余暇来管法国革命了。各专制王朝都把法国革命当作自己共同的敌人了。

由于各国一致行动，很快便在欧洲结成了反法同盟：瑞典与俄国联合起来，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合起来。各国参加同盟也有为自己打算的一面：奥地利和普鲁士真正想继续扩充领士；俄国想瓜分彼兰；英国、德意志和瑞典想借打击法国革命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阿图瓦伯爵则在为这种种阴谋推波助澜，他在各国支持下在科布伦次建立了军队，伺机反扑。法国被反动势力所包围，形势对法国很不利。

1791 年，在曼图亚，各同盟国制定了出兵法国的计划。同年 8 月 27 日，普鲁士等国发表了宣言，对法国进行战争恐吓。面对强敌，法国人民表现了无畏的精神，人们坚决要求抵御外国的侵略。议会也马上征集了 10 万人的国民自卫军，准备应付敌人的进攻。

1792 年，战争爆发。战争初期，由于法军缺乏作战经验和畏敌情绪，加之内部的叛乱，法军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反法军队步步逼近。面临反法大军压境的状况，法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签订协议投降，要么继续战斗，打退敌人的进攻。此时，领导法国革命的是吉伦特党，它要继续进行革命，只有响应人民的号召，罢黜国王，采取救国措施。议会于 7 月 5 日庄严宣市：“公民们，祖国在危险中！”号召所有法国人拿起武器。人们热烈地响应这一号召。9 月 1 日，人们发出紧急集合信号，敲钟鸣炮。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人物丹东在议会上说：“大家听到的并不是告急的炮声，而是向敌人冲锋的步伐声，要想战胜敌人，打垮敌人，应该怎么办呢？大胆，再大胆，还是大胆！”斗志昂扬的法国人怀着为祖国献身的愿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9 月 20 日，法军在瓦尔密打败了普鲁士军队，这一战的胜利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此后，法军愈战愈勇，他们一鼓作气收复了失陷的凡尔登和隆维以及其他被敌人占据过的地方。法国人将他们的敌人全部逐出了国境。因而这次战役以法国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瓦尔密大捷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转折点。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把革命进

行到底。革命派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就应该肃清法国国内暗藏的敌人。这些暗藏的敌人里通外国，愿意把法国拱手让给反法同盟。一位革命派人物明确指出：“祖国已陷于危急，不是因为缺乏军队，不是因为我军不勇敢，国防不巩固，资源不充足，……不是的。祖国陷于危机，是因为有人使祖国的力量瘫痪了。是谁呢？只有一个人，就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国民变成了宫廷的玩具。这是我们当前局势的奥秘所在，是罪恶的根源，应该首先从这里下药。”丹东、罗伯斯比尔、法布尔·德格兰丁、马拉等人组织了一个在野党，这个在野党必须进行革命使自己从群众中进入议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这一手段是正确的：雅各宾派掌握了权力，丹东、马拉、罗伯斯比尔等人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1792 年 8 月 10 日夜，警钟声再次响彻了巴黎上空，巴黎人民又起义了，起义者集合整队，准备进攻王宫。王宫当时有众多军队把守，路易十六对防备的森严和完备感到自信，然而当他在早晨 5 点钟巡视王宫守军的时候，守军中已发生了分裂。有人呼喊着：“国民万岁！”这一迹象令国王不免忧心忡忡。当晚，起义者就占领了王宫。胜利了！胜利了！人们呼喊着。君主制度的命运就在这呼喊声中决定了。

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这次起义又把法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792 年 8 月 10 日后，全国各地进行了国民公会的

选举，罗伯斯比尔、马拉等人在大选中当选。瓦尔密大捷后，国民公会于 9 月 21 日在巴黎开幕，法国开始了第一共和国时期。

这时，党派之争愈演愈烈。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公开对抗。雅各宾派要求将革命继续下去，彻底消灭封建制度，这一派的领导人是丹东。吉伦特派则认为自己的政策更合乎道义，他们不希望流血而挽救革命。最后较量的结果是雅各宾派取得了绝对优势，而吉伦特派不甘失败。他们在国民公会中组织了一个 12 人委员会，企图阻挠雅各宾派的活动，这也是吉伦特派仅有的最后一次尝试了。

国内的暴乱使得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又处于动荡之中。里昂、马赛和波尔多都出现了武装叛乱，并且有 60 多个郡响应了暴动。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一度甚嚣尘上，1793 年 6 月，一位名叫夏洛特·科黛的少女刺杀了雅各宾派的著名领导者马拉。与此同时，法国所有边境又都面临着欧洲列强的威胁。1793 年 2 月，英国加入了反法同盟，并成为这一同盟的核心。同盟的其他成员国有西班牙、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所有选候国，以及普鲁士等国家。此时，雅各宾派作为最具实力的政党，在风雨飘摇中掌握了法国最高权力。

雅各宾派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逮捕一切嫌疑分子，实行全民皆兵。救国委员会应运而生了。这个委员会采取了严厉的措施，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根据这一条例，路易十六的遗孀、王后马丽·安托瓦内特被判处死刑。立宪派的头脑人物巴伊、山岳党内部的奥尔良公爵，以及吉伦特派的一批领导人也都被推上了断头台。同时，法国成了一个巨大的军营，凡是年满 18 至 25 岁的法国人都武装起来，以征集新兵补充军队，并用征来的粮食供给军用。法国人在一种不同寻常的境况下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聚集起来。在很短一段时期内，法国肃清了国内的反对势力，外国军队也在国境线上被击退了。

外敌被打败，内乱被平定，形势暂时有了缓和。然而雅各宾派却出现了分裂。以丹东为首形成了温和派。他们主张取消革命政府和各委员会的独裁统治，释放全部嫌疑犯。丹东的行为在狂热的爱国派看来是暧昧的，因此他

失去了权力，被革命派抛弃了。

以新闻记者埃贝尔为首形成了极左派，他们要求将镇压行为继续下去。罗伯斯比尔对两派的主张似乎都不以为然，他有自己的见解，他对极左革命派势力的发展感到震惊，他甚至把这一派与外部敌人相提并论。他攻击这一派时说：“ 现在，他们正处心积虑地利用自由的武器来破坏自由，利用哲学来重新挑动内战。 ”他身为救国委员会的领导人，受一种激进思想的引导，因此与丹东的温和主张是有分歧的。罗伯斯比尔这一思想使他对两派都采取了弹压的手段。罗伯斯比尔镇压左派，使他失去了群众的支持。 1794 年 7 月，各派反罗伯斯比尔的势力联合起来，发动政变，罗帕斯比尔被处死。他的死标志着革命运动已接近尾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高潮过去了。

雅各宾派统治被颠覆，热月党人掌握了政权。1795 年 10 月，法国成立了督政府。在它成立初期，共和国的形势又发生了巨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敌人卷土重来，法国重新面临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在法国政坛上崛起。1799 年 11 月 9 日，盒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从此开始了他 15 年的统治时期。虽然滑铁卢一战给他的军事生涯划上了句号，然而他的军队却把法国的风尚、思想和较先进的文明带到了欧洲各地。1814 年 5 月，路易十八回到了巴黎，封建王朝复辟了，但这已经是这种制度的回光反照罢了。

纵观法国大革命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法国革命有两个明确的目的：自由的政体和比较完善的制度。特权等级要以三级会议来反对宫廷，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要利用 1791 年宪法来反对特权阶级，反对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而群众则要以自己的宪法来反对其他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这些政权，没有一个能持续很久，因为它们都带有排他性。但是，每个暂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在争取政权的尝试中，都摧毁了前一统治阶级中的不能容忍的东西，以及与以平等和公平分配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法国社会宗旨所背道而驰的东西。

法国革命以法律代替了个人专断独行，以平等代替了特权；革命使工业得以腾飞，农业摆脱了封建领属关系；革命把一切都复归于一个等级、一个法律、一个民族。革命虽然遇到了重重阻力，但它终于达到了目的：摧毁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法国大革命不仅对法国、欧洲，而且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的宪章运动

19 世纪的欧洲，充满了烈火、鲜血、刀剑和死亡；在不列颠的土地上，也掀起了一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产业革命使得英国主要工业部门都采用了机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日益残酷；父母在叹息，子女在呻吟，心中炽热的怒火，就要喷发。“鲜血染红了普里斯吞和勃莱克本的街头，而杀人犯尤未餍足。坚强起来……鼓起勇气……做一个男子汉！”工人阶级在蓝色的欧罗巴洲首次显示了他们强大的实力。这就是英国工人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宪章运动在工人运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英国是进行产业革命最早的国家。英国产业革命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到 19 世纪 40 年代前后基本完成。产业革命是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一场技术革命。1840 年，英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 45%，被称为“世界工厂”。产业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工厂制的普遍建立，近代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也产生了。

由于资本愈来愈集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日益残酷，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

在 1832 年的议会改革中，英国无产阶级并未获得选举权及其他政治权利，辉格党执政后却颁布了“新贫民法”，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终于使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更重要的还要进行独立的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

1836 年 6 月，伦敦工人协会成立了，其前身为“争取廉价与正直报刊的工人协会”，木匠威廉·勒佛特成为该会的中心人物，该协会首先在出版业方面，尽一切合法手段，组织工人，作为全国范围内联系工人群众的机构，并竭尽全力协助并支援“我们的弟兄”。这个协会开始着重于宣传教育，但后来不久即展开群众运动，可以看为是宪章运动的前奏。

正当辉格党人在议会中对“厉行节约”的主张大加渲染和争吵时——该主张即“凡是工资不多的各个劳动人民阶层应当积聚充足的资财，以便在晚年自维生计”，实际上是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使贫民靠更精粝的食物过活。工人协会的一个委员会被选举出来了，并且拟就了一份法案。这份法案体现了工人阶级对政治权利的要求，被称为“人民宪章”，正是这份宪章，激励着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人民宪章包括六大要点，即成年男女普选权，议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无记名投票法，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给薪俸，平均分配选举区域等。为了发动这个新的运动而随即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人民群众以高涨的热情参加了集会，接受了人民宪章，并且为之而大声疾呼“为它进行鼓动吧，不达到全部目标，誓不罢休”。

宪章运动机构——伦敦工人协会成立后，就为实现宪章进行比较公开的宣传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实干家威廉·勒佛特；另一个是著名演说家享利·文森特，他那流畅的口才和慷慨激昂的演说，赢得了大量的听众。他的动人心魄的语调把听众的热情煽动起来，有很多人完全出于好奇心，常来参加他的集会，参加的人各种成份都有，甚至有很多富有阶层的人。为了使宣传活动更深入更广泛，伦敦工人协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二便士快讯》，后改名为《伦敦快讯》。该报内容几乎全部报道政

治改革，有时也会涉及到一些人民生活疾苦的问题，它的伟大目标是把宪章制订成法律，使它具有约束力。由于伦敦协会的榜样，各地协会也创办了自己的报刊，以加强民主宣传，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当时各地的主要报纸有苏格兰奥康纳创办的《北极星报》、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北方解放者》、爱丁堡的《真正苏格兰人》、伯明翰的《伯明翰日报》等等。

除了对人民宪章的大力宣传外，他们还在一些重大的中心地点，举行了一系列的示威游行。每个星期日，都有大批人士加入“激进派”的行列。1838 年 5 月 28 日，工人们在格拉斯哥（英国南部一城市）自己举行了一次声势壮大的示威行动，几乎没依靠任何其他阶级的协助。浩浩荡荡的人群排成六列纵队，大踏步前进，而在整个路线的各条街道上，又挤满了稠密的人群，他们都渴望参加这项旨在实现政治改革的重大行动。据估计，不少于 20 万名健壮的劳动人民在这次盛大集会上显露了他们疲劳的笑容，天空中回荡着轻快的乐曲和群众热烈的呐喊。大会的主席阿特伍德在发言中非常有力而又富有感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疾苦，认为 1832 年的修正法案企图增进国家利益，到头来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接着阐明由伯明翰政治联合会达成协议的行动计划——联合中产阶级人士举行一次总罢工。最后，他大声疾呼：“反对我们的是所有的贵族、十分之九的绅士、庞大的牧师队伍和一切养老金的领取者、无功受禄的冗员、以民脂民膏为生的吸血鬼。”这次集会作为宪章运动第一次高潮到来的前奏，已显示了它非凡的影响力。

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人民宪章的原则，宪章运动领导人发起组织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发动起义的时刻。

1839 年 2 月 4 日，第一次宪章大会在伦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观点，在领导人内部也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一种是道义派，这派人认为应该用一切道义的力量来抵拒一切反对力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另一派是暴力派，他们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宪章的六大要点。在会上，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哈尼为代表的极端暴力派，他们认为只有举行武装起义，才能达到目的，并宣称举行武装起义的时机已到，起义已经迫在眉睫，一触即发，企图很快地将会议推向前进，通过他们的主张。但是许多代表都反对他的这种愚蠢而鲁莽的作法。而另一部分道义派的代表则坚持他们的主张，认为集会后即递交请愿书，而不应该采取扩大势态的某些步骤，这种意见，大会同样没通过并和暴力派一样受到批评。由于意见分歧很大，最终也没找到一个真正切实可行，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一些代表退出了宪章大会，从而使宪章运动派力量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削弱。

尽管首次代表大会遇到波折，群众的激昂情绪，尤其在较大的城镇中，仍然保持下去，而所有群众集会的参加者还是十分踊跃。大多数代表虽然都对暴力比较感兴趣，但普遍认为武装暴动的时机远未成熟，应着重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宪章六大原则的实现，而且对于集会请愿问题，若请愿书中发出的呼吁遭到拒绝，则必须采取某些措施，因为保证已经提出，而希望也已唤起。代表大会还于 2 月 16 日，通过了《宪章公会宣言》。宣言号召人民“……你们所要求的就是普选……这种权利决非人力所能公然剥夺，也是你们必须冒任何危险重新争取的——可能的话，用和平的手段；必要的话，就用武力”。宣言庄严宣告“如果当权者执迷不悟，痴想借助武力，那么一旦他们敢于动用武力来摧残不列颠的民主自由，他们立刻会碰到人民坚如磐石的意志的还

击——如不战胜，决不生还”。宣言还要求人民做到“处事审慎，言论稳健，意志坚定，行动果决。”这个宣言，庄严神圣地宣告了人民群众，无产阶级要求获得政治权利，并且要为之而奋斗不懈，而不管资产阶级新贵族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破坏、阻挠，甚至于无情镇压。

早在 1838 年，伯明翰宪章派著名政治活动家道格拉斯就起草了一份将由全国民主主义者签名后呈交英国议会的请愿书，该请愿书大部分只提出了资产阶级的要求，该请愿书并不是一份成熟的请愿书，但它仍然重申了宪章运动的主要原则。请愿书上写到：“我们处于苛捐杂税的压迫下，可是还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求；商人在破产的边缘上挣扎；工人们饿得要死；资金不能获得利润，劳力得不到报酬；工匠的家庭什么也没有，当铺却堆满东西；济贫院拥挤不堪，制造厂却无人光顾。”“普遍选举必能，也唯有它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我们坚信它也会带来繁荣。”面对宪章运动的蓬勃发展，面对不断壮大的人民群众，资产阶级用尽心机，他们派遣大量间谍和叛徒混入集会队伍，企图诱致轻率从事的触法行为，然后就向那些罪犯猛扑，企图激怒群众走向疯狂和叛乱。他们在威尔士挑起扰乱，又在兰开夏诱致少数不够谨慎的人违背六项法令，举行操练和演习。他们用种种奸诈的手段，企图激起一次不成动的暴动，以此为借口解散宪章公会，禁止任何为要求人民宪章而召集的群众大会，并取缔仅存的一些宪法权利和保障；他们把一些仇视人民的敌人武装起来，企图来解除宪章运动者合法的武装。面对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宪章运动领导人告诫全体不列颠人民，应严格地遵守法令，同时还要充分做好准备，使压迫者同样遵守法令，准备用自己的武器还击任何以暴力压制和平运动的违背宪法的企图。

请愿书于 1839 年 7 月 12 日在议会提出，以 46 票对 235 票被否决。议会甚至提出，任用城市警备队在全国各地弹压和平性质的群众集会是必要和合理的。公开为那些镇压人民的资产阶级卫道士进行辩护，激起了人民的强烈愤慨。由于人民准备并不充分，又不具备条件，原计划 8 月 12 日开始实行的总罢工不能按期举行，大规模的抵制抗议活动也没有举行，威尔士及其他各地正在开始筹划举行武装起义。1839 年 11 月 4 日，几千名威尔士矿工在约翰·福劳斯特的领导下向新港进军，发动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新港起义”。这次起义达到了 1839 年宪章运动的高潮，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最终这次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是这次武装起义是工人阶级以暴力行动来谋求自己政治利益的伟大尝试。同时，也是工人阶级以革命的武力对付反革命的武力的伟大革命运动。

11 月 4 日上午，大约 1 万余名工人从威尔士矿山上走下来，向新港进发。晚上，尽管天公不作美，整夜下着倾盆大雨，工人们被淋得湿透，他们在阴沉的夜色中前进，约在次日上午 9 时，到达了新港。他们中许多人自备武器，一部分人扛着步枪，另一部分人执着长矛，第三批人带着草耙，第四批人拿着大头短棒，但相当多的人是赤手空拳，未带武器。到达新港后，群众首先奔向一个西门旅馆，一到旅馆门口，攻击立即开始，治安官、警察和特警被迫从街上退却，躲进旅馆。士兵们把守着窗口，而群众则往窗内攻击。由于武器装备差，加上敌人援兵的迅速赶到，这次起义失败了。

新港起义失败后，事件的主要领导人福劳斯特、威廉斯、琼斯皆被判死刑，后由于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的广泛舆论压力，减刑改为驱逐出境。前后约有 400 余人被判刑。

除了在新港地区，英国当局在其它地方也采取有力的手段镇压宪章运动，而且所用的方式就是利用最卑劣的爪牙来为他们制造罪状。例如，谢菲尔德的许多宪章运动者因被控进行阴谋活动和非法宣誓而遭逮捕。指控他们的见证人自认曾参加他们的阴谋，主要指武装起义，最后许多人被判刑。在辉格党政府疯狂的反攻倒算下，宪章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一时的压抑正是酝酿一场更大规模风暴的前兆。

革命者是不会轻易被压垮的，在最后几名宪章运动被告还未被提审时，有些人已在努力对宪章运动团体进行改组了。最初的宪章公会，由于仅是地方性公会的集中，不利于对整个宪章运动的领导，在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许多协会现在已经名存实亡。1840 年 7 月 20 日，这天正好是星期一，代表们在曼彻斯特开会，商讨改组问题，拟定新的计划，使这个团体的地位有所改善。经过各郡选出的 23 名代表的热烈讨论，决定把所有地方组织合并成一个协会，命名为“大不列颠全国宪章协会”。这个新的协会的基础是人民宪章。协会规定，除了用和平合法的方式以外不采取其他手段来实现上述目标。另外，还通过了《全国宪章协会的组织计划》，并且规定了入会途径、会员资格与会员权利义务以及组织章程等。全国宪章协会的组成标志着宪章运动第二阶段的开始，它已摆脱动摇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而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英国的无产阶级便从过去自发地进行各种经济斗争，发展到有明确政治纲领、政治要求的革命运动了。

全国宪章协会的组织计划，普遍地被宪章运动团体所接受，在全国的许多城镇，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加入了全国协会。这时，宪章运动的部分领导人即将获释，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新的希望。首先获释的领导人是威廉·勒佛特和约翰·柯林斯，他们在幽禁中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脸色相当憔悴。为了欢迎这两位领导人的获释，伯明翰于 7 月 27 日星期一举行了示威集会，一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广大群众欢呼声震天动地，许多妇女挥舞手绢，表示欢迎。群众的热情又被呼唤起来，他们又憧憬着未来。

1841 年夏季来临，英国大选开始了。宪章运动领导人决定同辉格党政府相对抗，赶走辉格党人。这时，他们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实行亲托利党的政策，宪章运动者投票选举托利党，实际上成为该党的工具。宪章派采取任何策略都不可能比这个策略带来更致命的后果，这样，不仅给辉格党人以口实，造成人民宪章的威信下降，而且造成了领导人内部的不团结，损伤了自己。支持托利党，实际就象投票支持一个可能的最凶恶敌人一样，因为辉格党也好，托利党也好，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来看，都同样是专制权的维护者。托利党和辉格党一样，他们并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同样要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宪章运动领导人并没有认清托利党的阶级实质。由于宪章运动领导人缺乏正确分析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本质的眼光，结果导致了 1841 年的失策。由于这种失策，造成了整个阵营的分裂，给宪章运动带来了极其不幸的后果。

1842 年 5 月，全国宪章协会进行第二次请愿活动。第二次请愿书更明显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口吻，比第一次请愿书更为大胆激烈，签名者达 300 余万人。请愿书中对工人阶级所受的各种压迫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对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平等”进行了无情地批驳，在请愿书中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这份请愿书大大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巨富敛积的内幕，“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面对这样一份宣战书似的请愿书，资产阶级议会再

次给予无情的拒绝——49 票对 487 票。

第二次请愿又失败了，人民群众再次被资产阶级所欺骗，心中的怒火顿时爆发出来，不列颠的土地上又一次掀起了罢工浪潮，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自发的人民起义。但是，由于全国宪章协会领导集团的脆弱（1841 年的分裂），对这次罢工未加以领导，结果罢工运动遭到失败，许多领袖及工人被捕，使革命力量再次受到严重摧残。

1842 年 8 月 12 日，全国宪章协会召开大会，讨论罢工局势，会议通过了《全国宪章协会宣言》，宣言号召人们，“我们已为自由投出了骰子，值此胜负未分之际，我们必须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屹立不动，任何人都不可灰心丧气。”但是，会议没有讨论出具体的行动步骤，整个罢工运动仍然是一盘散沙，遭到了当局的无情镇压。在罢工运动中，许多优秀的工人充分表现了他们彻底的革命性，而且在审讯中揭露了工人的悲惨状况。如理查·匹林在法庭上的发言中谈到，他维持自己和家小的生活颇感困难，他的次子 16 岁，去年因患痨病而离开工作，而他当时又减薪至 9.75 便士一班，这样每周收入 16 先令，家中 9 口人，而房租每周 3 先令，眼前还躺着一个有气无力的生病的儿子，若厂主们再扣去四分之一的工资，他宁可自杀，也不愿在棉织厂里拼出性命一天工作 12 小时，只能吃到马铃薯和盐屑。

1848 年的欧洲革命，是国际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封建势力的一次大汇演。欧洲国家，从巴黎到华沙，从柏林到布达佩斯，到处都是人民群众要求民主自由的高昂的口号声和为实现宪政的激烈的枪炮声。2 月 22 日巴黎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革命的马赛曲和“打倒基佐！”的口号响遍全城。次日晨，革命群众与反革命军队展开激烈巷战，和平示威转变成武装起义。许多国民自卫军士兵拒绝向革命群众开枪，公开支持革命。到 24 日晨，巴黎的重要据点都被工人和革命群众占领。国王路易·菲力普逃往英国。史称法国“二月革命”。

1842 年，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被镇压下去以后，宪章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其本身活动也变得更加保守。宪章运动一直处于低谷。以前主张采取暴力的某些领导人在失败面前，开始在某些领域进行改革试验，而实际上也是一种改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的地位，但是这些改良在 1848 年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也归于失败。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后，人们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再也不能沉默了，按捺不住压在心中的怒火，纷纷走上街头。

当时存在的灾难是可怕的——人们处境不可能再坏了。千万人的眼睛发出饥饿的火焰。……各州郡里，局势开始显得十分危急。在格拉斯哥，苦难的情况最为严重。3 月 6 日，一场严重的暴动发生了。失业的工人曾希望领到配给的粮食，但结果并没有发放，他们为饥饿所驱，绝望所苦，就列队走向铁栅街和其他交通要衢，冲进出售食粮和枪枝的店家。只有那些盗贼和同类的流氓才在必需品之外拿别的东西。交易停顿，店铺关门。人们在大街上游行，喊叫：“没有面包就革命。”警卫无能为力，军队被召来应付，宣读暴动法，但是同时又有别的群众队伍朝不同方向走去，拥入粮店，索取面包。事变益形扩大，地方首长甚至向爱丁堡要求调动更多的军队。翌日，群众又在波列冶镇集合，那里临时雇佣的打手已全副武装起来。一个男孩用泥块掷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孩子立即被捕。当群众去救援时，警察长斯马特中尉下令开枪，结果是 5 人受枪伤，其中数人立即死亡。军队继续在群众列队的大

街巡行，所有的国家机关都严密地防守着。

1848 年 3 月，在英国到处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人民起来反抗当局的示威游行和暴动。为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宪章执行委员会于 4 月 3 日召开了宪章公会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决议，决定在 4 月 10 日左右再次请愿，并称“如全国性的请愿为下议院所拒绝，本会决定准备一份全国陈情书，要求女王解散目前的议会，并且只召集那些愿意采纳人民宪章作为内阁政策的大臣们来商议。”他们表示在召开国民大会，向女王递呈全国陈情书，在宪章未成为国家的法律前永不解散。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宣传工作也做得深入细致，一次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将在英吉利的土地上席卷开来

4 月 10 日的和平请愿活动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议会为了应付紧急局势，迅速通过了一项残暴的法令，这项法令是，对企图“使用暴力影响国君与政府”者处于重刑的紧急法。10 日上午游行队伍从会议大厅出发前往凯宁顿草场上，那里集合着 25 万自由的人们，然后有消息传来说任何游行队伍不准过河。人民群众已经落入反动政府设置的陷井中，桥梁已被封锁，政府狠毒的指令是以武力作为后盾的，规模如此庞大，仿佛有 20 万全副武装的敌军要围攻首都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宪章派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在政府的淫威之下屈服了，没有采用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的方法，而是采取了一种所谓的“不流血”方法，用妥协的办法放弃了人民的权利，而宪章运动领导人还寄希望于 4 月 24 日举行的国民大会。由于英国政府对宪章运动的打击，对其领导人的迫害及其内部就国民大会的召开问题亦产生分歧，宪章派元老奥康纳公开宣称国民议会为非法组织，并且赢得了一部分支持者。国民大会推迟至 5 月 1 日举行，只有极少数的宪章派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也作出了一些决议，无奈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力，最后不得不自行宣布解散。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就这样逐渐消沉了下去。

宪章运动虽然在英国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宪章运动的功绩不可磨灭。列宁曾经给宪章运动高度的评价。恩格斯也称全国宪章协会是“第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宪章运动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的先驱，它开创了工人运动的新纪元，使工人阶级的斗争由自化的状态进入到了自觉的状态。

宪章运动持续了 12 年之久，是一个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史。1836 年，在经济危机的推动下，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1837 年伦敦工人协会拟定了一个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内容的请愿书。同年 5 月这个请愿书被命名为《人民宪章》，号召人们签字。1840 年，成立了全国宪章协会。宪章运动先后在 1839、1842、1848 年出现高潮，最多时有 500 多万人投入斗争行列。他们提出 10 小时工作日法案、结社法的修订、各行业工会之自由权利、以及组织合作社、罢工、支援“歇业”或“停工”之可能性，主要是依靠宪章运动组织的存在和行动。宪章运动具有良好的基础，而工人阶级则起了核心的作用。

宪章运动又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才能最后获得胜利，否则会使革命夭折；最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团结。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宪章运动的高潮看，无不因为没有一个领导核心而似一盘散沙归于失败。新港起义，组织不严密，仓猝暴动，无准

备，而且事先对工人未进行宣传动员，而导致开小差过多；第二次请愿，全国宪章运动协会未利用有利时机进行统一领导指挥。而各地之间缺乏联系，经验亦不足，有利于各个击破。从宪章运动高层领导集团的不断削弱看，也反映了意见不一，分歧较大，导致内部分裂，反而有利了敌人。从 1848 年的第三次请愿失败来看，关键在于宪章运动领导人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妄图以和平的方式来使当权者妥协。高喊着“民主和自由”的当权者仅自己享有民主，却不给人民群众以相应的自由，人民又何必以当权者规定的无理义务来约束自己的自由呢？宪章运动也给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而马克思本人亦在 1854 年给英国工人议会的一封信中盛赞了宪章运动者，说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过去的艰苦斗争的经验和现在的精神力量。”

宪章运动中，有许多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他们为了人民宪章的实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即使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也奋斗终身。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地激励着后来的人们为了神圣的目标，彻底解放自己而努力奋斗。